

中國知識群體眼中的 美國大選

● 吳靖、雲國強

2008年的美國大選曾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精神狂歡，不僅激活了美國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久已麻木的政治熱情，還受到了全球媒體、知識界和民眾的狂熱追捧。

2008年的美國大選曾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精神狂歡。一個並沒有太多新意的競選口號——「變革」(change)，不僅激活了美國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久已麻木的政治熱情，還受到了全球媒體、知識界和民眾的狂熱追捧。世界在忍受了八年的布什主義(Bush Doctrine)之後，對於美國的軍事單邊主義、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踐踏人權和國際道義、加大全球貧富差距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及在全球環境和生態問題上不負責任的自私自利等問題，已經積壓了太多的怨恨。在美國國內，大選期間爆發的金融海嘯成為壓倒共和黨的最後一根稻草。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競選過程中，一反往日民主黨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而尋求中間路線、模糊自身意識形態立場的機會主義做法，在經濟、稅收、戰爭、反恐等議題上，都明確而雄辯地闡釋了自由左翼的立場，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他經受住了被共和黨

指責為「社會主義者」的競選攻擊，以壓倒性的優勢最終贏得總統寶座，也讓人們驚喜地看到美國政治光譜的悄然變化。

在一個被稱為「後現代」和政治冷漠、娛樂至死的時代，奧巴馬頗具理想主義味道的人格表演和嚴肅的競選方式，卻能夠感召網絡一代從助選到投票一路積極參與政治，喚醒雅皮士們(yuppies)長期沉睡的對進步主義的信心和熱情，讓人們切實地感受到介入、參與和社會變革之間的相關性。全球知識群體似乎從2008年美國大選中，看到了理念與價值觀從可有可無的邊緣，重新回到社會進程中心的希望。一個實用的、消極的、勢利的、臣服於強權的世界，突然間通過對奧巴馬的追捧發現了自身深埋於心的理想主義情懷；知識群體也從中找回了批判現實、尋求可替代的社會制度、對公眾發言等傳統的知識份子行為對於當下社會的意義。

* 感謝方可成、方坤、李思閩、武傳藝、吳琦、左燦等同學在訪談階段對本文做出的貢獻，並在許多次愉快的交談中為本文提供了思想資源和靈感。

中國的公眾和知識界為甚麼關注美國大選？中國媒體對美國大選也進行了詳細的追蹤報導，網絡社區和手機短信傳遞着各類有關美國大選和候選人的消息，中國民眾對大選中的人物和事件都耳熟能詳、如數家珍。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群體，也大都成了奧巴馬的擁躉。究竟他們從美國大選的進程或者候選人身上看到了甚麼令他們興奮不已和值得期待的事情？他們所想像的奧巴馬和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想像有甚麼區別和相似之處？中國知識群體對政治、全球秩序、經濟與文化議題有甚麼獨特的觀點和想法？中國人投射到奧巴馬身上的理想、期盼和焦慮是甚麼？經由對美國大選的觀察和闡釋，折射出中國知識群體怎樣的處事之道、自我定位、社會理念和政治關懷？

對這些問題的好奇心導致了本次探索性的研究。我們希望藉由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觸摸到當代中國知識群體的生存方式、心態與理想。

一 半結構性訪談：知識生活和觀念態度的快照

無論是「知識群體」、「知識人」，還是「知識階層」，或者是更加具有特定含義的「知識份子」，都是一些充滿爭議以及難以明確界定的概念。在中國，一方面知識階層的產生是全球現代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們的自我認識和身份定位也由本土的近代歷史所形塑。中國近代知識群體歷經傳統社會的解體、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同歷史階段，從官學一體到道統崩塌後的精神流亡者，從縉紳名士到飢餓的藝術家，從以市場為依託

的獨立文人到技術官僚和科技專家，從啟蒙家和革命者到工人階級的一份子，從特立獨行的思想者到唯唯諾諾的白領和公職人員，每一種身份背後都有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變遷的底色①。在當下的中國，如果有甚麼是知識群體所共有的特徵，那就是他們身份認同的曖昧、混雜和變動不居。

在知識人或知識份子棲身的眾多職業中，我們認為大學是尋找和研究當代中國知識群體心態的最佳場所。在全球性的社會與經濟結構的變遷，尤其是傳媒、出版和藝術行業官僚化和商業化的大趨勢中，大學成為許多傳統的以文字和著作為生的知識份子的避難所。關於學科、專業和知識獨立性的話語，仍舊能夠成為學者抵制政經干涉的最佳藉口。此外，大學還是培養下一代知識群體、傳承知識份子精神傳統的地方。大學裏的學生，今後不論走上甚麼樣的工作崗位，都將是知識群體中的一員。他們在大學中學會了知識群體的專業技能，並有可能形成了知識份子的社會意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由於文化氛圍和學

中國人投射到奧巴馬身上的理想、期盼和焦慮是甚麼？經由對美國大選的觀察和闡釋，折射出中國知識群體怎樣的處事之道、自我定位、社會理念和政治關懷？



中國媒體對美國大選的報導

當代全球知識份子關心的議題，從具體的意識形態爭議和全球問題，到選舉模式、技術發展和民主制度的一般性問題，都可以藉由討論2008年美國大選而引發出來。

習生活的相對單純，大學時代成為一個人實踐知識份子特性最純粹、最徹底的一段時期。

因此，我們選擇對高校中的教師和學生群體進行半結構性訪談，以期達到管中窺豹的效果。我們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兩個高校為主體，一共訪談了46位高校知識群體的成員。因為我們期望了解高校知識群體的一般特性，所以並沒有特意尋找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或者知名學者。並且，我們選擇訪談對象時，有意識地在人文社科和理工科，以及教師和學生的人數上做了平衡，希望了解專業分工和代際差異對知識份子意識的影響。我們共設置了6個訪談問題，每次訪談時間從20到40分鐘不等，並在訪談時盡量鼓勵受訪者隨意談論他們認為相關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次美國大選非常適合作為一個知識份子話題的發射器，圍繞它可以生發出一系列當代全球知識份子關心的議題，從具體的意識形態爭議和全球問題，到選舉模式、技術發展和民主制度的一般性問題，都可以藉由討論2008年美國大選而引發出來。

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對2008年美國大選有所了解，但聲稱自己對之非常關注的只佔二分之一左右，還有四五個人明確表示自己並不關心，但媒體和身邊的人談論的焦點都是它，故無法躲避。由此可見，中國社會對這次美國大選表現出來的熱情和媒體的密集報導有直接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接觸的媒體也十分具有新時代的特徵，即便是在高校知識群體中的調查，網絡和電視也成為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有16人在訪談中提到「新浪網」，是這次訪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媒體；其次是「鳳凰衛視」，有10人；

「搜狐」、「新華網」和「騰訊QQ」各有6人提到；有8人提到會在網上或圖書館閱讀西方的媒體。此外，分別有5人提到他們閱讀《參考消息》和《新京報》，是這次調查中閱讀率最高的紙媒。如果按照網絡、電視和紙媒的劃分來作統計，提到它們的人數分別為45、14和32。

由於調查的抽樣不具有隨機性，我們很難得出在統計上具有代表性的結論，但有幾點值得思考：第一點是被調查的人群使用各種媒介技術獲取信息、內容和觀點的能力與資源是不成問題的，這符合人們對知識群體的一般判斷；第二點是電視在這個群體中的邊緣地位，這也符合電視屬於娛樂和大眾文化的通常看法；第三點是探索性的，通過這次訪談，我們並沒有發現中國目前有哪些特別受知識群體喜愛的，或具有知識份子特性的大眾傳媒。知識份子是以對文化和符號的使用獲得其群體命名的^②，媒介在知識份子生態的形成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屬於知識份子的公共媒體的缺失，一定會對當代中國知識群體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身份產生影響。

在討論大選本身時，人們談到次數最多的議題是經濟政策，有27次，伊拉克問題有10人提到。另外，有4到5人提到稅收、共和黨對外政策的失誤、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危機等具體議題和名詞。只有1人提到對華政策是這次美國大選的重要議題之一。但當談到受訪者本身關心的議題時，有15人提到對華政策，5人提到台灣問題，8人提到種族問題。另外分別有11人和5人認為自己比較關心經濟議題和美國的對外政策。這說明接受訪談的群體有明確的「自我」和「他者」區隔的意識，能夠體察到「全球」和「本

士」的區別，並且較為自覺地採取本土視角和立場。另一方面，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支持奧巴馬，只有兩人支持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 (John McCain)，其他人或是表示自己沒有傾向，或是迴避了這個問題。

二 愛恨交加／冷眼旁觀： 中國知識群體的美國觀

美國是一面現代性之鏡，考察中國人如何觀看這面鏡子，就是在考察我們現代性想像的複雜面向。許多研究者都指出，中國知識群體心目中通常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天使，一個是惡魔^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兩個美國的幻象或交替出現，或糾結在一起，它們實際上都是中國知識份子身份焦慮和國族情懷的投射。天使的美國是自由與民主的燈塔、是工業發達的富庶之鄉，它映射着中國人對現代性的傾慕；魔鬼的美國是揮舞大棒的世界警察、是居高臨下的驕橫帝國，它刺激着中國文人脆弱的民族自尊。正如學者袁明所說：「『美國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在中國知識份子看來，這是一個動感情的問題。因為美國總是與中國人的痛苦與希望聯繫在一起。」^④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知識份子心中是否仍舊對美國存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他們是否還將美國作為自己家國情懷和啟蒙理想最重要的參照系？確實有受訪者是這樣表述的，但只是極少數。在訪談中，對美國的政治和文化表示完全欽佩和認同的有兩人；而與許多人對當代中國青年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擔憂相反，在本次訪談中沒有人以中國國家利益

為由，提出對美國的嚴厲指責。不少人例行公事般提到美國的台灣政策和中美關係是他們關心的議題之一，但他們對克林頓 (William J. Clinton)、布什 (George W. Bush)、奧巴馬、麥凱恩的對華政策及其差異卻所知甚少，許多人都是在憑印象隨意揣摩，語焉不詳。

更有意思的是，當人們解釋自己對候選人的傾向時，之前談到的對中美關係的關心幾乎都拋到了九霄雲外了，沒有人以此作為選擇的重要標準。這一方面說明這個知識群體善於用多重視角和超越性思維來看待國際事務，並不是「中國中心主義者」；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美國在中國國家發展和中國人的認同建構中愈來愈處於邊緣的地位。

但是，慣性思維還是頑強地存在。對於為甚麼要關注美國大選，大多數人不假思索、也不帶過多感情地表示，因為美國是一個重要的世界大國。問題是，在訪談中，只有一個人提到「這一次」大選的重要性，但僅是表揚這次大選比以往的要「更公正」，這與全球的「奧巴馬熱」(Obama fever)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的受訪者更願意從一般性的層面談論美國，他們對美國政治的評價集中在一正一反兩個觀點上。正面的是美國的制度比較完善，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政策也有延續性，不會因為選舉而改變；反面的是美國的選舉背後有金錢和精英在操縱，並不必然代表真正的民意。我們發現，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教師居多，而學生更傾向於表達後一種觀點：

「它的選舉對內政外交並不會有太大影響……畢竟是個法制國家，它

中國知識份子心中是否仍舊對美國存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他們是否還將美國作為自己家國情懷和啟蒙理想最重要的參照系？確實有受訪者是這樣表述的，但只是極少數。

無論那架運轉良好、動力充沛的美國制度機器是否只是一個幻景，它至少幫助中國知識份子「理性」地「反觀」自己的社會，在表現「深刻」的同時輕鬆地卸下自己身上的責任或者壓在心底的負罪感。

的政策和制度都有延續性。」(國際關係，教師)

「這件事情更證明了在美國社會中，仍然保持着精英對國家的治理。」(工科，教師)

「不管美國人誰當總統，都會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不會因為個人原因而改變。因為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理科，教師)

「美國的制度好到甚麼程度，像胡適說的，阿貓阿狗都可以當總統，制度好，無所謂，誰當都不會有大問題。」(政府管理，教師)

「〔民主〕就是靠錢堆出來，然後很多人去選……誰的錢多，誰的通過率就大些。」(信息管理，學生)

「那種選舉制度最後的結果就是，必然是要有錢才能參選，候選人必須有很強大的經濟支柱。」(土木工程，學生)

「美國總統是代表資產階級、大財團利益的。奧巴馬……也成為財團利益的代言人。」(生物，學生)

「其實我感覺，總統競選就是個面上的東西，身後那些資源都還是白人的。」(電子，學生)

「黑人當總統怎麼說呢，我覺得政治這個東西沒有它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關鍵還是利益集團在操控。」(電子，學生)

……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中年以上的知識份子和青年一代顯示出比較明顯的代際差異。雖然感情色彩沒有那麼濃烈，但年長的一代仍會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對美國制度的讚美，甚至是對美國的充分信任，信任到認為根本不用去關心具體的選舉議題和時代特徵，美國就可以自動運轉、自我調適。

在中國知識份子的思維方式中，顯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制度救國」的集體無意識。也許是中國通向現代性的道路過於曲折，人們心底總是期望存在那個「神奇藥丸」，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頑疾。在現實過於充盈、難以言說的時候，祭起制度的大旗可以最方便地達到認知協調。無論那架運轉良好、動力充沛的美國制度機器是否只是一個幻景，它至少幫助中國知識份子「理性」地「反觀」自己的社會，在表現「深刻」的同時輕鬆地卸下自己身上的責任或者壓在心底的負罪感——制度使然，我們是無可奈何的。

從某個角度來看，「80後」一代對美國民主的弊端教科書式的、倒背如流的批判，與老一代知識份子之間的差距並沒有表面上顯示的那麼大。他們眼中的美國民主多少是個騙局，但是在幻影背後仍舊有一個堅實的「結構」——精英、利益集團——在保證社會的穩定運行。雖然許多受訪者輕鬆說出這次美國大選的主題是「變革」，但這個群體的大多數並不相信變革真的會發生，在經濟、美中關係，甚至種族問題等方面，他們都做出了謹慎而保守的預測：變化是有限的，因為美國的制度、社會結構，乃至中美之間的利益關係，都有既定的模式，不會因為一個黑馬式的人物當上總統就會有甚麼實質性的變化。因此，不論是對美國制度的讚美，還是對其民主遊戲的不屑一顧，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模式：社會既有的運作方式不會被輕易地改變；民主政治與其他政治模式的區別，只是讓民眾更愉快、更心甘情願地接受現狀。

這種老練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觀，並不僅限於知識群體對美國社會的解讀。當被問及美國民主政治對中

國是否有借鑒意義時，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是簡單的「沒有」，而理由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中國的國情、人口素質、目前的漸進變革是正確的方向、集中決策的高效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其言外之意在於，中國也被當作一架自動運行的機器，知識份子對這架機器的運轉以及自身在其中的位置是基本滿意的，不認為需要進行修正，也不準備把社會的運行方式和自身的能力與志向有機地加以聯繫。除了少數幾個受訪者從美國的道德感召、中國在選舉制度方面的實質性變革，以及全球激進民主作為資本主義民主的替代制度的可能性等方面，透露了他們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視野之外，大多數受訪者都以一種冷靜的旁觀者的態度描述美國、民主、中國的發展這些傳統上讓人「動感情」的議題。

歷史確實翻開了新的一頁。從對美國由愛恨交加到冷眼旁觀的改變，我們發現高校知識群體的精神生活出現了明顯的保守化和犬儒主義的傾向。1990年代以來中國整個文化、思想和哲學領域「告別革命」的運動，看來在今天已經生根發芽。

三 專業主義、個人主義及其他：知識群體如何注視社會

許多知識份子研究者都指出，超越職業的普遍性關懷是這個群體的特質。但是我們在訪談中發現，當代中國高校的知識群體更習慣於從專業的角度出發來表達觀點。在談及他們所關心的美國大選議題時，大多數受訪者都自然而然地把答案與自己的專業

聯繫起來，如美國研究的學者關心美國文化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協調問題，法律專業的關注大選中遇到的法律問題(因此這位受訪者指出，相比之下，他更關注布什與戈爾[Albert Gore]之間的競選，因為那次選舉的結果最終需要法院裁決)，傳播學者關心說服策略或跨文化交流，研究經濟管理的關注經濟，而研究政府管理的學者會對選舉制度與選舉文化侃侃而談。

體現專業化思維最典型的是兩個研究生的回答。一個體育專業的研究生對美國大選的議題不清楚，但聲稱關注「跟體育相關的議題，因為與自己的專業有關。但是美國的體育制度已經相對完善，所以沒有再單獨提出議題來作為自己加分的砝碼」。另外，一個生物專業的說：「其實最關心的是奧巴馬是否會當選總統，其他的不太感興趣，你讓我去關心金融危機如何解決的話，對於一點都不理解經濟的我來說，就有點太搞笑了。」

高校中的知識群體都在特定專業中有深入的研究經歷，他們在討論某個社會議題時會強調自己較熟悉的領域，對此有更系統和精到的闡釋，這並不奇怪。但問題在於，受訪者大都認為他們只能從專業的角度來關心一件事情；甚至是專業學習和研究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社會關懷或其他興趣，促使他們去關注，因為不少人提到因為工作學習繁忙，沒有時間去關注和專業無關的東西。這說明專業分工已經成為這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專業化的思維已經超出職業的範疇進入到公共和私人生活的領域，專業成為統領人們一切觀念的結構性力量。這似乎表明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系統(system)對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殖民這種現代性的疾病^⑤，

歷史確實翻開了新的一頁。高校知識群體的精神生活出現了明顯的保守化和犬儒主義的傾向。1990年代以來中國整個文化、思想和哲學領域「告別革命」的運動，看來在今天已經生根發芽。

中國的新舊媒體在對這次大選的報導中，基本上成為美國主流傳媒的傳聲筒。出於隔岸觀火的心態和所謂客觀平衡的職業規則，中國的媒體中並沒有出現多少立場鮮明的評論。

已經在中國知識群體身上有了明顯的體現，而這個群體的成員本來應該是社會中最具有整體性視野和普遍性追求的人。

斯諾 (Charles P. Snow) 在《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 一書中指出，大學中人文學科和專業技術學科的學者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兩者之間很難溝通^⑥。但在我們的訪談中，文理工科的學者、學生在技術性和專業主義意識上極為相似，他們都只願意從自身專業所規定的範疇來表達觀點，對專業以外的問題表現出漠然或信心不足。在《最後的知識份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一書中，雅各比 (Russell Jacoby) 認為真正的知識份子應該面向廣大的公眾發言，以期產生社會影響，而不是龜縮在專業主義的小圈子中滿足於相互之間的交流^⑦。在我們的訪談者中，絕大多數並不是這樣的「知識份子」。

但是，也有幾個文學專業的學者和學生與大多數人稍有不同。兩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分別從宗教與文化認同和政治與社會改革方面講述了他們的美國觀和對中國問題的關切，一位研究比較文學的學者提出全球人民民主的烏托邦理想，另一位外國語學院的研究生表示關注美國「在中東方面的戰略，這個戰爭(伊拉克)以及他們的策略，純粹出自於一種理想的世界和平的想法」。

鄭也夫曾經指出，中國大學比其他許多國家都更加輕視人文學科，這是中國社會長期形成的唯物主義世界觀與歷史觀，以及近期出現的功利主義與拜金主義倫理所導致的^⑧。人文教育的缺失使得人們只能從技術層面理解周圍的現實，而無法對社會結構

和自身處境之間的關係有總體性的理解和關注。因此，我們發現受訪的知識群體很少能夠將他們專業化的觀察和其他社會與歷史過程聯繫在一起。全球化、戰爭、金融危機、資本主義、人與自然的關係等這些由這次美國大選在全球知識份子乃至公民社會中引發的議題，並沒有出現在中國高校知識群體的言談中。

相比於教師對專業框架的自覺內化，學生群體更傾向於從個人體驗的層面來描述他們對社會的認知。首先，個人感覺和從媒體中得到的印象，成為許多人評論和選擇候選人的重要基礎：

「更喜歡奧巴馬，因為他更有煽動力，是一個出色的公眾演說家。我記得民眾在街上喊他的名字，印象非常深刻。」

「最開始看好希拉里，因為其夫本是總統，又是受害者，本人非常美麗、有氣質。一開始並不知道奧巴馬此人，預測到 he 會贏。但是我看好麥凱恩，因為他比較成熟。」

「我當然傾向奧巴馬啦。代表變革嘛，一個新的面孔，還挺有風度的。」

「感覺奧巴馬是一個年輕的領袖，他的思維非常的活躍，另外一方就顯得相對比較保守，畢竟年齡也比較大嘛。」

……

在商業媒體的介入下，政治競選變成廣告攻勢和產品營銷，對候選人個人形象的虛假選擇代替了對他們的政治綱領的真實抉擇，許多評論家早已指出美國選舉文化中的這一趨勢，並哀嘆傳媒公共領域功能的衰落^⑨。

但是，年輕一代在2008年美國大選中的表現，卻令人眼前一亮。互聯網、手機等新媒介在他們手中成為突破傳統媒體過度商業化、憤世嫉俗和自以為是的陳詞濫調的強大武器，把一場屬於新一代的選舉進行得嚴肅、漂亮、有聲有色。

然而，中國的新舊媒體在對這次大選的報導中，基本上成為美國主流傳媒的傳聲筒。出於隔岸觀火的心態和所謂客觀平衡的職業規則，中國的媒體中並沒有出現多少立場鮮明的評論（在我們的訪談中，幾乎沒有人能夠說出令他們印象深刻的評論文章或評論家），而是充斥了各種信息、描述和花邊報導。而我們的受訪者對媒體的反應也大多是被動的，基本停留在對主流報導的接受，很少有人主動通過另類媒體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於是，本來就已經浸淫在《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等選秀文化當中、又對政治懷有疑慮甚至不屑一顧的中國當代青年，很容易將這次選舉看作是又一場「政治選秀」，當中的戲劇性和精彩刺激，又是《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 這類商業選秀所無法比擬的。

在我們的訪談中，個人主義的另一個表現是，許多人都喜歡用自己對社會某個具體側面的個人化觀察來推導出一些普遍性的結論：

「〔美國人〕對中國人的認識總是停留在很多年前，總覺得中國人沒甚麼錢……現在到美國去，租個房子生活，對中國很多稍微好一點的工薪階層，這根本不算甚麼。」

「我不覺得〔美國〕有甚麼特別吸引我或者比我們現代化，但它科研方面確實不錯，別的沒有。」

「美國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好。因為去了以後，很多東西跟中國沒有

太大的區別……我原來老說西方工作效率高，但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他們窮人的生活也是很苦的，亞特蘭大有很多黑人，生活挺苦的，犯罪率也會高一些，晚上九點以後少出去。」

……

當代中國高校知識群體有許多機會親身接觸美國人和美國社會，許多在封閉時代形成的刻板印象因而被打破，比如美國非常發達、生產效率很高；但另外一些刻板形象反而因為實際經歷的確認而更加鞏固，比如美國的種族歧視和貧富分化。這些普遍存在的印象折射出中國知識群體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化。

在近些年的社會轉型中，中國的重點高校已經逐漸成為中產階層和準中產階層聚集並進一步積累社會與文化資本的機構。他們對自身的社會地位、所處的社會，以及社會核心的制度安排都懷有很強的自信心和滿足感。他們對美國社會的描述和評論開始顯現出富裕社會中的中產階級趣味。他們對經濟、文化和政治議題都可以進行理性、但基本不超出大眾傳媒所設置的框架和概念體系的討論，有一種對社會現狀和「常識」理所當然的信仰。他們以一種割裂的方式來審視和看待社會，專業主義和個人主義就是兩種典型的表現。現象和個體（而不是歷史與結構），成為他們對社會注視的切入點。

中國的中產階層和準中產階層以一種割裂的方式來審視和看待社會，專業主義和個人主義就是兩種典型的表現。現象和個體（而不是歷史與結構），成為他們對社會注視的切入點。

四 結語：知識份子與總體性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曾是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崇奉的倫理訓

誠。我們可以用現代話語將其轉譯為對知識份子身份和特性的表述：知識份子生產知識，知識份子體現社會的道義，知識份子的存在意味着現實還沒有實現總體性，知識份子努力修復或建設完整和完美的世界。知識份子告訴人們能夠知道甚麼，人們應該期待甚麼，以及人們應該怎樣行動。知識份子的思與行，不僅反映自身的境遇，同時也構成社會發展程度的表徵。我們這項調查的深度意義正在於：在考察當代高校知識群體對某些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與思考的同時，也提供了聯繫知識份子社會處境，以診斷其心性特質與社會關懷的線索。

就本研究所揭示的現狀而言，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在知識生產、道義和實踐三個原本辯證統一的方面發生了顯著的分裂。

大學學科設置在組織學術生產和知識積累的同時，也造成了知識群體的分化。學科領域的劃分割裂了知識群體的話語聯繫，除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種知識」決裂外，社會科學內部也由於知識旨趣的歧異而形成交流障礙，各學科為維護各自的領域而發展起嚴格的專業主義，圍繞其建構起堅硬的話語壁壘。另外，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各專業學科也因其同生產和市場領域的親疏而被劃分為熱門學科（如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經濟管理、金融等）和冷僻學科（如某些基礎科學以及文史哲等）。熱門學科處於大學學科體系的中心位置，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中擁有更大的社會和經濟資本。這些因素的捲入，使得知識生產成為功利性而不是超越性的活動。在知識份子共同體中，公共生活和公共話語空間所必

須的兩個支撐——學術民主和交往理性，受知識旨趣歧異和工具理性滲透而崩解了。

對於全球範圍的知識份子而言，2008年美國大選之所以備受關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它激活了知識份子的道義。各國知識份子的鼓舞與歡呼超越了國家、種族與文化的界限，他們都認為美國人的選擇符合了世界的道義。科塞 (Lewis A. Coser) 認為，知識份子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體工作，深入到意義和價值這類更具普遍性的領域之中」^⑩。世界各國為這次美國大選而歡呼的許多人，屬於這樣的知識份子。

但對於中國知識份子而言，本次調查顯示的結果有些令人失望，幾乎沒有人能夠主動地以某種超越性的道義去看待這次大選。當然，正如我們在文章開始所提到的，為了了解高校知識群體的一般狀態，我們的訪談避開了公共知識份子和知名學者，因此似乎不該斷言科塞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在中國少有了。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國確實有具有道德感召力和影響力的知識份子，高校知識群體應該是他們的重要聽眾和追隨者，我們應該能夠從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關懷中尋到蛛絲馬迹。我們的訪談表明，不論這種知識份子是否存在，他們並沒有對我們訪談的對象形成甚麼影響。我們的訪談既涉及了公共傳媒，也涉及了學術話語，兩者都是知識份子發言的重要場所，但仍舊收穫不多。這似乎揭示了中國知識份子生態的某種普遍性。我們認為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尋找原因。第一，「告別革命」的去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塑造了知識份子躲避崇高的心性特徵；第二，市場經濟

如果今天的中國確實有具有道德感召力和影響力的知識份子，高校知識群體應該是他們的重要聽眾和追隨者，我們應該能夠從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關懷中尋到蛛絲馬迹。

以及消費文化的興起滋養了一種無根的個人主義；第三，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的全球化訴求，削弱了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民族主義和世界新秩序的關注。

知識份子應該成為變革社會的一股重要力量，知識份子的自覺實踐是知識和道義辯證統一的必要過程。然而，我們的研究發現，高校知識群體的社會關懷和實踐能力已經減弱了。以知識社會學的方式對1980年代的知識份子和二十一世紀初期以來的高校知識群體作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彼此在實踐問題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對於前者而言，一切都懸而未決，知識份子希望訴諸公共辯論和其他行動尋求克難之道；後者儘管意識到權力瀰散在包括學術界在內的整個社會領域，然而我們的訪談又顯示出他們傾向於接受一切都是決定了的，因此放棄了尋求變革的欲望。

這種狀況更多地揭示了知識份子的時代處境，知識份子共同體已經被社會整合的力量撕裂了，知識的專業主義壁壘以及倫理上缺失歷史感和超越性社會關懷的傾向，使情況更加惡化。另外，知識份子還必須面對互聯網帶來的挑戰，由於信息爆炸而導致人們把獲取信息的手段等同於「知識」本身，知識份子身上的光環更加黯淡。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專業主義、個人主義，以及保守主義成為最後的避難所。

②⑩ 科塞(Lewis A. Coser)著，郭方等譯：《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頁2。

③ 陳生洛：〈兩個美國：中國大學生的美國觀〉，《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頁1-8；吳魯平：〈今日中國青年對美國的態度〉，《中國青年研究》，1996年第5期，頁17-19；楊玉聖：《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張濟順：《中國知識份子的美國觀(1943-195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④ 袁明：〈對當前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看美國的幾點思考〉，《美國研究》，1989年第2期，頁75。

⑤ 哈貝馬斯認為，系統是指工具理性統治的領域，比如市場、官僚體制和專業分工；而生活世界是指溝通和主體間性實踐的場域，而現代性的病灶之一就是工具理性不斷侵蝕交往理性，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參見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⑥ 斯諾(Charles P. Snow)著，紀樹立譯：《兩種文化》(北京：三聯書店，1995)。

⑦ 雅各比(Russell Jacoby)著，洪潔譯：《最後的知識份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4。

⑧ 鄭也夫：《知識份子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頁264。

⑨ W. Lance Bennett, *The Governing Crisis: Media, Money, and Marketing in American Elec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高校知識群體的社會關懷和實踐能力已經減弱了。儘管他們意識到權力瀰散在包括學術界在內的整個社會領域，然而他們傾向於接受一切都是決定了的，因此放棄了尋求變革的欲望。

註釋

① 許紀霖：〈「斷裂社會」中的知識份子〉，載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1。

吳 靖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副教授

雲國強 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
教於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